

国外语言学译丛  
经典教材



PHONOLOGY  
·  
IN  
·  
THE TWENTIETH CENTURY

# 二十世纪音系学

[美] 斯蒂芬·R. 安德森 著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国外语言学译丛  
经典教材



PHONOLOGY  
·  
IN  
·  
THE TWENTIETH CENTURY

# 二十世纪音系学

[美] 斯蒂芬·R. 安德森 著

曲长亮 译

钱军 审校



始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5年·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二十世纪音系学/(美)安德森著;曲长亮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国外语言学译丛·经典教材)

ISBN 978-7-100-11035-8

I. ①二… II. ①安… ②曲… III. ①语音系统—研究—20世纪 IV. ①H0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07191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 二十世纪音系学

[美]斯蒂芬·R.安德森 著

曲长亮 译

钱军 审校

---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市艺辉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1035-8

---

2015年5月第1版 开本 880×1230 1/32

2015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20

定价: 52.00元

# 总 序

商务印书馆要出版一个“国外语言学译丛”，把当代主要在西方出版的一些好的语言学论著翻译引介到国内来，这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

有人问，我国的语言研究有悠久的历史，有自己并不逊色的传统，为什么还要引介西方的著作呢？其实，世界范围内各种学术传统的碰撞、交流和交融是永恒的，大体而言东方语言学和西方语言学有差别这固然是事实，但是东方西方的语言学都是语言学，都属于人类探求语言本质和语言规律的努力，这更是事实。西方的语言学也是在吸收东方语言学家智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比如现在新兴的、在国内也备受关注的“认知语言学”，其中有很多思想和理念就跟东方的学术传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又有人问，一百余年来，我们从西方借鉴理论和方法一直没有停息，往往是西方流行的一种理论还没有很好掌握，还没来得及运用，人家已经换用新的理论、新的方法了，我们老是在赶潮流，老是跟不上，应该怎样来对待这种处境呢？毋庸讳言，近一二百年来西方语言学确实有大量成果代表了人类语言研究的最高水准，是人类共同的财富。我们需要的是历史发展的眼光、科

学进步的观念,加上宽广平和的心态。一时的落后不等于永久的落后,要超过别人,就要先把人家的(其实也是属于全人类的)好的东西学到手,至少学到一个合格的程度。

还有人问,如何才能在借鉴之后有我们自己的创新呢?借鉴毕竟是手段,创新才是目的。近一二百年来西方语言学的视野的确比我们开阔,他们关心的语言数量和种类比我们多得多,但是也不可否认,他们的理论还多多少少带有一些“印欧语中心”的偏向。这虽然是不可完全避免的,但是我们在借鉴的时候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批判的眼光是不可缺少的。理论总要受事实的检验,我们所熟悉的语言(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在语言类型上有跟印欧语很不一样的特点。总之,学习人家的理论和方法,既要学进去,还要跳得出,这样才会有自己的创新。

希望广大读者能从这套译丛中得到收益。

沈家煊

2012年6月

## 译者序

2004年,我鼓足勇气,带着《西方音系学流派》的提纲和样章,来到赵忠德教授的办公室。我希望能够模仿刘润清先生的经典著作《西方语言学流派》,把音系学的发展脉络深入浅出地勾勒出来,以填补国内的研究空白。让我倍感惊喜的是,从赵老师那里,我得到的不仅是肯定,更是鼓励。经过5年多的努力,我完成了约10万字的书稿,赵老师拿出了自己筹备新著用的20多万字,志同道合的曹仁松、张燕、周佳萍、何志波等昔日同窗各自写出几万字,后期更有鲜明女士的强势加盟。于是,我最初设想的小书变成了60万字的大部头《西方音系学理论与流派》。虽然赵老师有生之年未能看到该书面世,但先生的期望与嘱托,我始终没有忘记。

先生的嘱托之一,就是希望我们能够以耶鲁大学斯蒂芬·罗伯特·安德森教授的《二十世纪音系学》为样板,把研究做得严谨、翔实、有效,同时也能够把这部集流派、思想、文本研究于一身的理论瑰宝推荐给更多读者。

如今,我完整译出了《二十世纪音系学》全文,希望这部出版30年来影响不减的经典著作能够为中国的语言学学习者、研究者提供一个了解音系学、思考音系学、研究音系学的新契机。

斯蒂芬·罗伯特·安德森教授 1969 年起先后执教于哈佛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耶鲁大学，并任美国科学促进会正式会员、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美国语言学学会主席、国际语言学家常设委员会副主席等职务，所著 *Phonolog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A-Morphous Morphology*、*Aspects of the Theory of Clitics*、*Doctor Dolittle's Delusion: Animals and the Uniqueness of Human Language* 等语言学理论著作，对学界影响深远。

音系学在 20 世纪走过的历程，值得理论语言学研究者仔细回味。音系学虽然和形态学、句法学、语义学共同构成理论语言学的核心，但却经历了不甚相同的路线。理论语言学中的大多数分支学科，大都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然而关于语音的研究却并非如此。“现代欧洲文明受益于古希腊、罗马颇多，但语音学（更无须说音系学）却并非其一”（Clark & Yallop, 1995: 389）。由于 19 世纪以前的传统语法以书面规范语言为研究对象，对口语关注不足，因此重语法、重逻辑、轻语音的总趋势似乎不足为奇。

19 世纪，随着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兴起，语音逐渐得到了充分的重视和科学的研究，并开始 in 理论语言学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雅各布·格林（Jacob Grimm, 1785—1863）著名的《德语语法》（*Deutsche Grammatik*, 1840）对音变规律做出突破性探索；奥古斯特·施莱歇尔（August Schleicher, 1821—1868）、赫尔曼·格拉斯曼（Hermann Grassmann, 1809—1877）、卡尔·维尔纳（Karl Verner, 1846—1896）、卡尔·布鲁格曼（Karl

Brugmann, 1849—1919)等人所做的历史性贡献,皆在于对语音现象的阐释。赫尔曼·保罗(Hermann Paul, 1846—1921)的《语言历史之原则》(*Prinzipien der Sprachgeschichte*, 1880)用大篇幅探讨语音变化。20世纪伊始,爱德华·济弗斯(Eduard Sievers, 1850—1932)的《语音学原理》(*Grundzüge der Phonetik*, 1901)一度成为语音学研究之标准。即使是在对具体语言的语法描写中,研究探索语音历时演变过程的路子也依然清晰可见,如奥托·叶斯柏森(Otto Jespersen, 1860—1943)、乔治·库尔默(George Curme, 1860—1948)对英语、德语语法的描写。

19世纪70年代起,语音共时研究思想分别从东欧、西欧、北美多个源头兴起。在俄罗斯喀山,波兰语言学家扬·博杜安·德·库尔德内(Jan Baudouin de Courtenay, 1845—1929)和米柯沃依·克鲁舍夫斯基(Mikołaj Kruszewski, 1851—1887)为代表的喀山学派语言学家提出了音位的现代含义(Kruszewski, 1881; Baudouin de Courtenay, 1895),并对语音学与音系学的区别作了初步的探讨。在瑞士日内瓦,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 1857—1913)的三度普通语言学讲座已在明确关注历史演变以外的语音问题。在美国,弗兰茨·鲍阿斯(Franz Boas, 1858—1942)、爱德华·萨丕尔(Edward Sapir, 1884—1939)、列奥纳多·布龙菲尔德(Leonard Bloomfield, 1887—1949)等学者分别从不同视角对音位进行定义,对语音现象进行分析,成为实证型音系学研究之典范。这类新型研究从根本上改变了历时演变一统语音研究的格局,为现代音系学的产生奠



定了决定性基础。

音系学思想的集大成者，是布拉格学派学者，其中特鲁别茨科依(Nikolai Sergejevich Trubetzkoy, 1890—1938)和雅柯布森(Roman Osipovich Jakobson, 1896—1982)的贡献尤为突出。特鲁别茨科依的《音系学原理》(*Grundzüge der Phonologie*, 1939)从索绪尔的语言-言语之对立出发，强调功能对立在语音-意义研究中的重要地位，成功地将音系学和语音学区分开来，成为音系学发展史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雅柯布森的区别特征理论更是为音系学 20 世纪后半叶的纵深发展铺平了道路，成为生成音系学和各种非线性音系学理论的基础。

作为一部学科断代史，安德森的《二十世纪音系学》既在结构主义音系学的上述源头之间架起桥梁，又在结构主义音系学和生成音系学之间架起桥梁。穿起整部历史的，是“规则”(rule)和“表达式”(representation)这两个核心概念。80 年代的生成音系学家对这组术语十分熟悉。但安德森对这组术语做了延伸，使之覆盖整个 20 世纪音系学：规则反映出的是相互联系的形式之间的关系，使原本不同的语言单位被视为“相同”；表达式则旨在表明这种“相同”的东西究竟是什么。音系学的各个流派虽然未必使用相同的术语，但在规则和表达式问题上均各有侧重，从而形成风格各异的“不完全赋值理论”“完全赋值基本变体音位理论”“完全赋值表层变体理论”。

安德森的文笔，精确而缜密，时而显露出一丝晦涩。正因如此，本书的英语原文难免会吓退部分读者。译者在翻译时本着意义对等、功能对等之原则，力图将其中的信息表达清楚，有时

不得不以牺牲形式对等为代价。这样做的益处,即在于最大程度避免使用晦涩的语言来谈论抽象的问题。不过,这样做的问题也显而易见,即原文的句式结构有时无法重现。这反映出的是翻译应当忠于内容还是忠于形式这一经典问题。为了汉语译文的语句畅达、信息准确,译者倾向于对原文中部分句式之美忍痛割爱。这一选择妥当与否,敬请读者评判。

本书中的术语,除个别情况之外,均遵循《语言学与音系学词典》(语文出版社,2000)中的译法。

曲长亮

2014年4月

## 中文版序

《二十世纪音系学》这份中文译本的出版,给了我莫大的快乐,因为这使我们领域中的一个日益引人瞩目的群体,能够更容易地读到这本书。近年来我已注意到,中国极其认真的语言学家数量庞大;我还注意到,这些学者针对纷繁的论题和语种进行了很有意义的研究。我希望本书的普及能够有助于中国读者更好地了解西方在语音结构领域的主要研究对象,并由此促进中国的语言学研究群体和西方的语言学研究群体之间的相互了解。

我1985年出版一本以此为题的书实在十分幼稚,因为那时20世纪还远未结束。事实上,80年代初,关于音系学基本问题的看法已经显现出相当程度的逆转,其中一部分已经在本书的最后一章中简要论述。然而,当时却极难想象出,这一领域不久就经历了重大变革。

如第十三章所勾勒,上述变革开始得十分平静,起初只是70年代中后期,注意力从乔姆斯基和哈勒(1968)所强调的对规则的本质和内容的关注,转向围绕着音系结构非线性概念而提出的更加丰富的音系表达式概念。戈尔德史密斯(Goldsmith, 1976、1979)提出了自主音段的主张,利博曼的著作中出现了词汇音系学(Lieberman, 1975; 亦可参见 Liberman & Prince, 1977),这之后,音系学家们基本上不再详细阐述规则、规则的抽

象性以及其它类似问题,转而聚焦于这些规则所产生的表达式有何本质。随着特征几何(Feature Geometry)方案在克莱门茨(Clements, 1985)、萨吉(Sagey, 1990)等人的著作中出现,研究工作中的这一新导向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在本书的语境中,强化对表达式概念的关注,并不是要摒弃音系结构本质上包含规则和表达式的观点,而只是基于这一认识:以形式为基础而做的阐释,应当主要依赖于关于表达式的限制性理论。正如麦卡锡(McCarthy, 1988: 84)所说:“首要重心应放在研究音系表达式上,而不是音系规则。简言之,如果表达式正确,规则就会继而正确。”

不过,1993年,阿兰·普林斯和保罗·斯摩棱斯基却发布了一份为音系学勾画出全然不同的纲要的手稿(手稿后来出版了,即 Prince & Smolensky 2004)。这部著作主张把经典的规则系统整体替换为一种完全不同的途径,这一新途径基于同时排列的可供违反的制约(constraint)体系——这就是优选论(Optimality Theory)。

优选论完全摒弃了把音系形式和语音形式联系起来的具体规则。取而代之的是,该理论为表层形式设定了一套制约,这套制约可分为两类:标记制约(Markedness constraints)要求形式满足根植于其语音内容之中的自然性条件,忠实制约(Faithfulness constraints)则要求底层形式或词汇形式的特征要在所得结果中得到保留。显然,这两者常常相互冲突,对某一语言的描写就由一套可决定此类冲突应如何解决的等级体系构成。

这一理论内部已不再存在表层形式的推导。取而代之的是,GEN函数为某一具体底层形式提供各种可能的表层对应形

式,而另一种 EVAL 函数则从中选出对于该语言中运行着的制约系统来说可提供最佳解决方案(即优选之“优”)的那个对应形式。

这种系统中的制约,在精神上与先前的诸多框架中的提法十分相似:例如,本书中提出的构成索绪尔(未明确说明)的完全赋值表层变体音系结构观(Fully Specified Surface Variant view of phonological structure)的表层形式规则模式,还有 70 年代生成音系学家们提出的那些“阴谋”。这些理论往往因为一个事实而无法成立:即,某一规则模式无论多么具有强制性,都基本无法完全避免例外。优选论中的制约等级允许制约受到违反(为了满足更高层级上的制约,恰恰就要让其受到违反),就避免了这一问题。

普林斯和斯摩梭斯基提出这一音系描写模型之后的几年内,该模型(通过各种途径)主导了北美和欧洲几乎所有音系学讨论场所和教学场所(其自身也在不可避免地发展演化着)。近期,在我 2014 年写下这篇序言时,我有一种印象,围绕着“不透明性”(opacity)概念的一小部分基本问题,正在迅速带来进一步的变革。这既包括重新引入曾经成为 60 年代、70 年代音系学招牌特点的某些类似规则的概念和推导结构,也包括摒弃优选论研究模式中一半以上的内容,使之让位于其他方法。但是,肯定无疑地预测这类事情显然为时过早。而我们十分清楚的是,从本书中所展示的“规则型理论”和“表达式型理论”之争的角度来看,20 世纪 90 年代以及 21 世纪的前十年,音系学研究经历了重大的重新定向。

本书的原版本于 1985 年出版时,它所试图描述的 20 世纪,

尚有一些极其重要的发展还没有发生。本书的确记录了 19 世纪 70 年代中期以来一个多世纪内的发展,但是,却并无法和“20 世纪音系学”这个范围对应起来。

虽然这个书名不甚精确,但是我相信,本书在过去的 30 年里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聚焦音系表达式之本质,细察将表达式和语音形式相联系的规则系统之特点,对于思考语音结构观长期以来的发展变化方式来说,二者之间的对立似乎是个追溯发展历程的有效途径。进一步说,我还相信,与本书所思考的那些历史人物相联系的那些观点,不仅得到了准确呈现,而且还对我们更具普遍性地理解音系形式具有重要意义。围绕着少量“伟人”来组织历史,有时会因忽视了历史所处的更广阔的画布而冒歪曲事实之风险。不过,对于语言学这样的十分狭小的领域来说,大人物之外的小人物相对较少,为这样的研究方法辩护就容易多了。

这并不是说,本书中所说的一切都应被视为本学科的最终结论,即使在本书所实际覆盖的时间界内也不例外。近来的研究成果为我们提供了大量宝贵细节,尤其是有关本书所描述的学者们的生平的细节,这些细节都需要融入进来,从而绘出一幅更全面的图景。

例如,约瑟夫(Joseph, 2012)最近研究了关于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极其复杂的一生的大量材料,也研究了索绪尔的生平大事和语言思想之间的联系。索绪尔的未发表笔记近年来也大量出版,虽然对这类材料的解读(甚至是年代确认)目前远未结束。关于布拉格语言学小组从成立之初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那些主

导人物,托曼(Toman,1995)提供了许多极具启发的资料,他所依据的档案资料是我1985年时无法获及的。达奈尔(Darnell,1990)对爱德华·萨丕尔生平的叙述,同样可帮助我们理解这位大人物在美国音系学产生中的作用。1987年,列奥纳德·布龙菲尔德诞辰百年之际出版的若干材料,均为他的生平和思想、他和同一时代其他学者的关系绘制了更加清晰的图画。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本书中探讨的重要历史人物,几乎没有谁没被作为专门书籍和文章的主题加以深入细致的研究,从而使我们对他(从本领域的社会学状况来看,直到近些年之前,几乎一直是男性为主)的生平和著作了解得更加清楚。

下列著作所提供的更多信息非常有价值,可帮助我们完成音系学思想发展中的主要人物的传记图景,不过,我似乎不想对他们在这些著作中所发展的理论观点进行折衷展示,也不想对本书中的内容进行重大修改。因此,我认为本书对研究语言学的学生,尤其是研究音系学的学生仍然具有价值。我希望中国学者也会觉得这个中文版本具有价值。

斯蒂芬·R. 安德森

康涅狄格州,基尔福德

2014年8月27日

---

\* “中文版序”所附“参考文献”见第34页该序言原文“References”。——编者注

# Phonolog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 Preface to the Chinese Edition

The appearance of this Chinese edition of *Phonolog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gives me great pleasure, as it makes the work more accessible to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audience within our field. In recent years I have become aware of the large number of extremely serious linguists in China, and of the interesting work being done on a wide range of topics and languages by these scholars. I hope that the availability of this book will help to increase familiarity in China with the major themes of Western research in the area of sound structure, and thereby contribute to a greater mutual 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Western linguistic communities.

It was surely very naive of me to publish a book with the present title in 1985, since the twentieth century was far from over at that point. In fact, the early 1980s had already seen a considerable degree of turnover in opinions regarding basic issues in phonology, some of which is surveyed briefly in the final chapter of the book. Nonetheless, it was quite difficult at



that point to envision the massive changes the field would soon undergo.

These began innocuously enough, as sketched in chapter 13, with a shift of attention in the mid to late 1970s from the classical concerns articulated by Chomsky & Halle (1968) with the nature and content of rules, moving to proposals about richer notions of phonological representation centering on non-linear notions of phonological structure. Following the Autosegmental proposals of Goldsmith (1976, 1979) and the emergence of Metrical Phonology in the work of Liberman (1975; cf. also Liberman & Prince 1977), phonologists largely abandoned questions of the detailed formulation of rules, their abstractness, and similar issues for a focus on the nature of the representations these rules manipulated. This redirection of research effort was further accentuated by the emergence of the program of Feature Geometry in the work of Clements (1985), Sagey (1990) and others.

In the context of the present work, this attention to enhanced notions of representation did not abandon a view of phonological structure as involving in essential ways both rules and representations: it was simply based on the idea that formally based explanation should rely primarily on restrictive theories of the latter. As McCarthy (1988: 84) formulated the point, “primary emphasis should be placed on studying